

绪论

晚清以降，中国一度处于外国作品的汉语翻译高潮之中。外籍汉译，不仅超越了民族、地区、文化的限制和拘束，是了解中西文学（文化）交流和影响的最好窗口，而且给中国现代作家带来了新的见闻、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开始从狭窄的本土地域走向辽阔的世界舞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清末民初的外籍汉译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其产生直接影响的多是翻译而不是原著。因此，从具体的汉译外籍入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就不致流入空泛。同时，研究外籍汉译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关系，还可为中国当前外国作品和理论翻译活动的活跃和复苏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总体来看，外籍汉译，既促发了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也赢得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的研究目光。

一是侧重于汉译外国文学作品原始文献的清理。如北京图书馆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外国文学》^①，中国版本图书馆的《1949—1979 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和提要》^②、《1980—1986 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和提要》^③，贾植芳、俞元桂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④，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中国学室的《汉译法

①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外国文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② 中国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 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和提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 中国版本图书馆编：《1980—1986 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和提要》，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1999年修订版。

④ 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图书目录》，张泽贤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版本闻见录（1905—1933）》、《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版本闻见录（1934—1949）》^①等。这类著作，虽较少反思和研究译者译、介行为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所存在的关系，却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原始的文献资料和确切的搜索路径。

二是着力于外国文学作品汉译历史的勾勒，较多概述和总揽不同国别作家作品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段的汉译情况。如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②，孙致礼的《1949—2008：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49—2008》^③，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④，邹振环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⑤、《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⑥，王向远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⑦、《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⑧，孟昭毅、李载道的《中国翻译文学史》^⑨，谢天振、查明建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⑩，马祖毅等人的5卷本《中国翻译通史》^⑪和《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⑫，查明建、谢天振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⑬，许均、宋学智的《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⑭，梅启波的《作为他者的欧洲：欧洲

① 张泽贤：《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版本闻见录（1905—1933）》，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版本闻见录（1934—1949）》，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

② 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

③ 孙致礼主编：《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49—2008》，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④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初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

⑥ 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⑦ 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⑧ 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⑨ 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⑩ 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2004年版。

⑪ 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版。其中古代部分一卷，现当代部分四卷。现当代部分第一卷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第二卷为“外国文学在中国”，第三卷为“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第四卷为“国内现当代研究翻译理论之概况”，是“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之一。

⑫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版。

⑬ 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⑭ 许均、宋学智：《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文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传播》^①，杨义主编的 5 卷本《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②等。这类著作，虽对汉译外籍所给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基本不予涉及或简单论及，却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历史线路和丰富的译介信息。

三是致力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或作家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宏观比较研究。如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③，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④，孙乃修的《屠格涅夫与中国》^⑤，刘海平、朱栋霖的《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⑥，马立安、高利克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⑦，智量等人的《俄国文学与中国》^⑧，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⑨，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⑩，钱林森的《法国作家与中国》^⑪，王锦厚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⑫，刘海平的《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⑬，陈建华的《20 世纪中俄文学关系》^⑭，周发祥、李岫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⑮，殷国明的《20 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⑯，罗钢的《历史汇流

① 梅启波：《作为他者的欧洲：欧洲文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包括连燕堂的近代卷、秦弓的五四时期卷、李今的三四十年代·俄苏卷、李宪瑜的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周发祥等人的十七年及“文革”卷、赵稀方的新时期卷，共 5 卷。

③ 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年初版，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8 年重版。

④ 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⑤ 孙乃修：《屠格涅夫与中国》，学林出版社 1988 年版。

⑥ 刘海平、朱栋霖：《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⑦ [捷克]马立安、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伍晓明、张文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2008 年重版。

⑧ 智量等：《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⑨ 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⑩ 田本相主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3 年。

⑪ 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⑫ 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⑬ 刘海平：《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⑭ 陈建华：《20 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

⑮ 周发祥、李岫主编：《中外文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⑯ 殷国明：《20 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家进化文学观、人的文学观、苦闷文学观、革命文学观的生成原因。

(2)外籍汉译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新潮紧密相关,其发生、发展与流变受制于现代作家接受译作影响程度的深浅。本书择取《莎乐美》(王尔德作、田汉译)、《文艺上的自然主义》(岛村抱月作、晓风译)、《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岩崎昶作、鲁迅译)等汉译名作,分别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美主义、自然主义、左翼电影运动诸种文学思潮的发生根源。

(3)外籍汉译与中国现代文学体式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体式全然告别了古典形态,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竞相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本书将把具体的汉译外籍作品与具体的现代文学体式一一对应考察,如《杜谨纳夫之名著》(屠格涅夫作、刘半农译)与散文诗、《秘密的中国》(基希作、周立波译)与报告文学、《黑奴吁天录》(斯托夫人作、林纾译)与话剧、《茶花女》(小仲马作、林纾译)与外国文学改编片等,进而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体式在生成过程中如何吸收、融合外国文学精髓的情形。

本书在浩如烟海的外籍汉译世界里,于清末民初西书中译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扣紧“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这一关键词,遴选出针对性强、有代表性的汉译外籍。这些译作形态各异,或为鸿篇巨制,或为作品结集,或为单篇小册,力图把握其原本、节译、摘译或全译之内容,收集其译注、传播、影响、接受等资料,从现代文学观念、思潮和体式等层面,主要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传播学、渊源学、译介学和媒介学等方法,历史发展面貌的勾勒与译作个案的分析相结合,解读和挖掘这些译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所起的作用。

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外籍汉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批准号09BZW054)、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外籍汉译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观念的发生”(批准号11K042)的结题成果,本书不仅吸收和借鉴了最新的学界成果,而且凝结着众多师长的智慧和心血,英年早逝的恩师罗成琰及其他同仁参与了课题的申报,卢付林、蔡颂等人参与了研究,其中第一章、第十章为卢付林撰写。因出版篇幅限制,删除了结题时提交的第三编四章,即《佳人奇遇》:梁启超的翻译缘由与对中国政治小

说的影响,《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张坤德的翻译策略与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关不住了》:胡适译诗与中国现代新诗成立的纪元,《飞鸟集》:泰戈尔诗歌与中国现代小诗的生成。同时,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湖南省级重点学科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部分经费的资助,在此一并说明和致谢。



第一编

外籍汉译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研究



第一章 《天演论》：严复译著与中国现代进化文学观的生成

严复译著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①。事实上，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密亚丹的《原富》、穆勒·约翰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位居严译名著之首的《天演论》，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新时代，更为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输入了新血液，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国文人百余年来不断解读、诠释的经典文本。正如曹聚仁所说，他近20年所读500多种回忆录几乎没有一个作者不说他们不受《天演论》的影响的，“如胡适那样皖南山谷中的孩子，他为什么以‘适’为名，即从《天演论》的‘适者生存’而来。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名‘陈竞存’，即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鲁迅也说他的世界观，就是赫胥黎替他开拓出来的。那是从‘洋鬼子’一变而为‘洋大人’的世代，优胜劣败的自然律太可怕了”^②。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至1897年《天演论》问世以前，已有多种经由传教士翻译的格致书籍中夹杂有进化论的介绍，但严复所译《天演论》确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进化论并产生巨大影响的译著。通过对《天演论》的翻译，严复引进、译介和传布的进化思想，不仅影响了与自己同时代的人们，还影响了下一代的五四文人，从而使五四文化人与进化论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胡适所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②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1~372页。

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以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①因此，学界有关第一本宣传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译著或者进化论输入中国始于严复的断言并不为过。蔡元培曾高度评价了严复的贡献，认为当时介绍西洋哲学的人中当推严复为第一，他的译书中最早且最有影响的应是《天演论》，因为“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②。严复所译《天演论》一反传统中国“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法古尊圣传统，公然提出了“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价值观。这种观念虽然忽视了历史演进过程中退化、循环、交错的复杂现象，将新旧、古今简单对立，但毕竟使国人从泥古不化、因循守旧的传统思维中解放了出来。梁启超等在19世纪末就已奠定了中国文学进化观念的基石，而曹聚仁所举三人中的胡适也在所受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进化文学观。自《天演论》问世以后，进化文学观在清末民初文坛蔚然成为一股颇具影响力的文学观念。

第一节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较早出现的中国文学进化论观念，始于1903年第7号的《新小说》。梁启超在《小说丛话》讨论伊始就明确提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③梁启超从康有为处接受“三世大同说”众所周知，而所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则源自严复。在《说群序》中，他明确提到了严复的影响：“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④“夫物竞天

① 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②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2页。

③ 饮冰等：《小说丛话》，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④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页。

择，优胜劣败，此天演学之公例也。”^① 在梁启超看来，进化论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② 事实上，这缘于梁启超对达尔文进化论曾经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1902年，旅居海外的梁启超写作了《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一文，对达尔文学说的特点及应用予以了探讨。梁启超指出，达尔文认为生物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生存竞争，而这种变迁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逐渐变化的，这种淘汰分为天然淘汰和人事淘汰两种，其淘汰的过程无休无止没有间断。在重视生物变迁和天然淘汰的基础上，梁启超特别关注进化论在人类社会中的三种应用：一是人事淘汰对于国家之作用，如古代斯巴达人用人事方法淘汰其子民，子女初生时要检验婴儿体格，羸弱者采用丢弃或杀戮的办法不令其延续，只留下强健者存活于世，结果斯巴达人因强武获得了竞争力；二是与教育事业关联很大，“盖今日文明世界，虽断无用斯巴达野蛮残酷之理，然知人之精神与体魄，皆能因所习而有非常之变化，以故近日学校，益注意于德育体育两途。昔维重教授者，今则尤重训练。可以悬一至善之目的，而使一国人，使世界人共向之以进。积日渐久，而必可以致之，此亦达尔文之学说与有力焉者也”；三是国与国之间同类竞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万物同竞争，而异类之竞争，不如同类之尤激烈。盖各自求食，而异类者，各有所适之食，彼此不甚相妨。虎之与牛也，狼之与羊也，鸟之与蛇也，其竞争不如虎之与虎狼之与狼蛇之与蛇也。大抵愈相近，则其争愈剧。人之与鱼鸟争，不如其与兽争之甚也；欧洲人与他洲之土蛮争，不如欧洲各国自争之甚也。而其争愈剧，则其所谓最适者愈出焉”。^③ 由此可见，梁启超所关心的三个核心主题是尚武精神、教育地位、人类竞争。总体来看，梁启超对于达尔文进化论认识的目的正如人们所云：“在人类的残酷竞争当中，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立于不被淘汰之地，就必须对

① 梁启超：《自由书·放弃自由之罪》，《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页。

②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4页。

③ 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17页。

自己的国民进行从尚武精神到德智的全面培育。”^①梁启超推崇达尔文，但并不完全满意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因为达尔文专注于现在而忽视了未来，“今世政治学家群学家之所论，虽言人人殊，要之皆重视现在，于未来少所措意焉，是可为浩叹也”^②，梁启超始终坚信人类社会的未来是可以预见并且是越来越好的。总之，进化论给了梁启超醍醐灌顶般的启示，使他意识到中国“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③。“优胜劣败”是一个残酷而现实的规律，中国必须与“天下”的其他国家竞争。因此，梁启超后来在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并提出了造就健全人格、提倡民权的“新民”概念，“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国家要强盛，必须人民自强；人民要自强，就必须进行“新民”活动，启民智，振民气，养民德。所谓“新民”，就是要用民主思想、民族主义、人权观念、自由平等、竞争进化等近代意识来改造国民精神。

翻开《新民说》，其开篇就云世界上的国家有一百多个，但能屹然立于不败之地、左右世界者仅四五个，原因即在于进化的结果。进化的内在因素，在于强与弱的悬殊对比及文明发展的程度高低。近代西方发达的原因，在于其发现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道理。西方国民文明程度高，而中国却缺乏国民意识，处于半文明时期，“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④，而进化论思想使国人知道国与国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在《论进步》中，梁启超说“竞争为进化之母”，历史“进化”乃物竞天择，中国之所以不昌乃因为千百年来大一统而竞争绝，而“竞争”却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是历史“进化”的动力。有了“竞争”，生物界、人类社会和文明才能不断发展永不停滞。“竞争”越激烈，则进步愈迅速；而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破坏；破坏旧的，才能建设新的。所以，他歌颂“破坏主义”：“其破坏者，复有踵起而破坏之者，随破坏，随建设，甲乙相

① 李军科：《梁启超的两种进化论及其政治含义》，《理论月刊》2012年第5期。

② 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4页。

③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4页。

④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页。

引，而进化之运，乃递衍于无穷。”^① 本着振奋中国、富强中国的目的，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始终贯彻着“进取冒险”和“尚武”之类的“进化”精神，如《论进取冒险》、《论尚武》等篇章可以显现，但梁启超的“新民”之道，更是通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文学新民”更是梁启超文化进化观的一个重要表现。

表面看来，文学新民说和传统载道说似乎都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其实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传统文学的载道教化观念要求以道德纲常理性情、正人心，目的是使人甘当臣民；而“文学新民”则是民权思想在文学中的体现，诚如梁启超所说：“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② 事实上，进化论改变了中国文人的文学观念甚至是思维方式和价值原则。从梁启超的文学救国论开始，近代文人就已将文学与民族道德、风俗人心以及人格的改造与更新联系了起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倡导“三界”革命的良苦用心。“诗界革命”提出新诗要有“新意境”，主要输入西方的新学说、新思想（社会科学方面）和新事物、新成就（自然科学方面）。“文界革命”提出输入“欧西文思”，即输入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1902年，梁启超以他常带感情的笔锋充满激情地向世人宣告：“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③ 这一振聋发聩、反复提及“新”字的经典性口号，是建立在新胜旧的进化论基础上的。在梁启超看来，要改变中国社会思想意识中各种落后的思想，需要文学（小说）来发挥作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

① 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2页。

②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0~51页。

③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10页。

所必槟”^①。这种把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虽然是绝对化的、片面的，但明显反叛了中国传统的小说观，也正是“进化论的精神及时肯定现代人的创造，以新胜过旧的逻辑将‘新’置于经典之上，甚至将‘新’神圣化、经典化”^②。为“新民”，梁启超以《新小说》为阵地，试图以“政治小说”为创作模式，不仅自己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未完），还译述了《世界末日记》、《十五小豪杰》、《佳人奇遇》等外国小说。虽然梁启超本人的小说创作只是政治宣传的传声筒，“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③，但充分表明了梁启超创作“新小说”的强烈的政治意图和寻找小说体式变革、建立政治小说模式的良好愿望，可以看到在进化论鼓舞下的一代人那种睥睨一世、横绝千古的胸襟和气魄。中国文学由此被置于进化史观的视野之中，清末民初文坛也由此掀起了一股浩大的文学进化观潮流。

第二节 白话实为文学之正宗

胡适虽然明确说到过在美国留学时自己思想观念所起的变化，并把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了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④，实际上在出国留学之前他就已经接触到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根据《四十自述》中相关片段的回忆，在上海澄衷学堂就读时的胡适，因教师杨千里的影响就已经阅读了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总之，在最容易受感动的少年时代，在中学生争相读《天演论》、作“物竞天择”^⑤文章的社会风气中，经历过思想上一种激烈变动的胡适已自命为“新

①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② 耿传明：《〈天演论〉的回声：清末民初知识群体的心态转换与价值翻转》，《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③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饮冰室合集》第11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④ 胡适：《〈藏晖室札记〉自序》，《胡适留学日记》，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页。

⑤ 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人物”了。显然，胡适的进化观是一种在吸收了严复、梁启超的进化观和杜威方法论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体系。

有学者指出，“进化主义”在五四时期已经“不再时兴”、“称霸二三十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经济决定论和唯物史观所取代”^①。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事实上，对五四新文化持疑义的保守主义者梁漱溟、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勱都以进化论为靠山，更不用说五四新文化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蔡元培、吴稚晖对于进化论的信奉了。如鲁迅称自己青年时代在南京读书时知道《天演论》后，一到星期日便马不停蹄地跑到城南去花了500文钱买了一厚本“白纸石印”的《天演论》，虽遭本家长辈训斥，但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依然我行我素，“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饽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②，沉浸在新鲜而可爱的进化世界中。总之，进化论弥漫在五四时期“不同人物和许多思潮之中，构成了一种普遍的‘论式’，甚至比‘科学和民主’还更有市场”^③。正因为进化思想的支持和指引，胡适才能在文学革命论争当中所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1月）、《实验主义》（1919年）、《白话文学史》（1921年）、《国语文学史》（1924年）等多篇著述中施展拳脚，展现自己的进化文学观。这种进化文学观，不仅使胡适在论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我曾用进化的方法去思想，而这种有进化性的思想习惯，就做了我此后在思想史及文学工作上的成功之钥。尤更奇怪的，这个历史的思想方法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守旧的人，而时常是进步的人。例如，我在中国对于文学革命的辩论，全是根据无可否认的历史进化的事实，且一向都非我的对方所能答复得来的”^④，而且掷地有声、应者云集，使许多人深受鼓舞，以实际行动加入了文学革命的阵营中。如陈独秀写出《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对胡适的观点予以支援；钱玄同写有《寄胡适之》、《寄陈独秀》等文，

① 参见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系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214页。

②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

③ 王中江：《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进化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页。

④ 胡适：《我的信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从语言文字进化角度说明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势在必行；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和散文、使用标点等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周作人撰写《人的文学》一文，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使文学革命内容更加具体化；鲁迅则以《狂人日记》等白话小说的创作实绩，表达对先驱者的“遵命”，终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场旨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运动。由此可见，正是把进化论当做发起文学革命和提倡白话文的基础和工具，胡适才能在新文学运动中暴得大名，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

以进化论为武器，胡适要求对一切事物都持“评判的态度”，宣称新文化、新思潮就是文化价值的重新定向，对于传统的圣贤教训、习惯势力、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要一一提出质疑：“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二、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三、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和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①也就是说，要确立一种崭新的态度——“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五四文人在生存竞争、新陈代谢的进化理论指导下对于传统所亮出的一面旗帜，胡适由此以进化论为工具表明了解释和重估中国传统文学的态度。对于文学的态度，胡适称自己“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②。因此，胡适用进化论去思考文学问题，并把进化观念与文学变革联系起来实属必然。

首先宣称白话取代文言的必然趋势。在他《四十自述》的附录中，可以看出其发动文学革命的动机乃基于原来的文字已处于半死状态，必须用活的文字来代替；它的死与活，也就是新与旧、落后与先进的关系。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从文学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了“文学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他力图用新的文学规范砸烂旧的僵死的文学，大胆提出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正宗的文学、活的文

①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国政 再造文明》，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6页。

②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0页。

学，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初步阐明了新文学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这里所谓的“八事”，概括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矛头直指旧文学的种种弊端，尤其涉及文学语言变革等重要问题。胡适清醒地知道，文学的变革进化是以文学语言的变革为突破口的。因此，胡适在1918年4月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来概括文学革命的宗旨，指出要创造“活文学”必须用国语，“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意在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为了论证白话文的合理性，胡适于1921年专门写出了一本专著《白话文学史》，用来扩大白话文的影响。在这里，胡适借“历史进化文学观”理论力图打破保守派对于古文的迷信，侧重于“文字工具的革新”，凸显文字形式改革的重要性，甚至不惜把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任务归结为文字工具的变革，认为“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而文字形式的新陈代谢决定了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①，从而使白话文学借新陈代谢的自然历史规律合法取代了古文文学的正宗地位。总之，胡适所确立的白话文学理念，没有照搬晚清的白话文主张，而是以文学进化观念洞察中国文学的进化趋势，“古今文学变迁的趋势，无论在散文或韵文方面，都是走向白话文学的大路”^②，从文学发展史的趋势承认白话文学为“正宗”。

其次指出新旧文学交替的必然趋势。胡适立足在线性时间观念基础之上考察新旧文学交替的必然趋势，1919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3卷3号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建立在线性时间观念基础之上的进化文学观。他说：“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③基于这样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胡适以进化论为武器，在时间的序列上考察文学的代际位移，把“言文合一”的“文学革命”说成是中外文学史上的一种共同规律，认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

①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美]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② 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③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1919年5月1日第3卷第3号。

进化之公理也”。这就是说，文学随时代变化，变化的方向是走向进步，因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①。胡适这一观念，看起来是王国维的同调，因为在王国维看来也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②，但两者实质不同，正如人云：“王国维在阐述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主张时，并不像后来的胡适那样，一再标榜其‘历史进化之眼光’，也没有时刻将‘进步’二字挂在口头。胡适的特别之处在于，前人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倡导文学新变，而胡适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文学新变即是‘进步’。”^③在胡适看来，文学乃人类生活状态的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所以文学也随时代变迁，因此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周秦有周秦的文学，汉魏有汉魏的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的文学。旧文学之所以必然被新文学所取代，是因为旧时代文学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程无丝毫联系，旧文学必须随着时代而变化，新文学必将应运而生，“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④。对于这一文学进化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缘于胡适对于中国旧文学传统特别是对晚清古文学的深入考察。如1923年胡适在上海《申报》50周年纪念刊上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就详细论述和分析了古文学何以是一种僵死的、必将衰亡的文学，此外还体现在他对《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考证上。胡适曾明确表示，明清这几部小说名著“由于它们用活文字（白话）来代替文言，对近代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贡献重大”；“这些小说名著便是过去好几百年，教授我们国语的老师和标准”，并且把“白话”这种“活的文字底形式统一了，并且标准化了”，“所以我们这一文学革命运动，事实上是负责把这一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上应有的地位”^⑤。事实上，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文学的时代变迁并不像胡适在进化链条上

①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1月1日第2卷第5号。

②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徐洪兴编选：《求善·求美·求真——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③ 李思清：《胡适文学进化观内涵之再探讨》，《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④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1919年5月1日第3卷第3号。

⑤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美]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